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 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钱志中

内容提要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关键词 文化工具主义 创意经济 社会融合 英国文化政策

钱志中,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副教授 2100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政策的多向度特征日趋明显:从哈罗德·威尔逊的“技术白热化”到后撒切尔时期的“想象力经济”(Economy for the Imagination),尤其是1997年布莱尔执政后,英国新工党试图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将文化政策的视角转向“创造力”与“创意经济”。由此,英国文化政策被设计为一种全新的范式:以文化创意为资本,以市场培育为手段,以艺术普及与文化教育为路径,实现政治结构稳定、社会包容和谐、全球经济竞争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社会目标。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聚合成为英国文化政策的鲜明特征。本文以英国文化工具主义的政策演化为分析起点,努力探寻英国文化政策目标多向度的深层政治与历史原因,并力图客观考察英国创意经济国家战略实施的实际效果,希望能够为中国文化战略的制订与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文化工具主义——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战略基石

文化工具主义是当代英国文化政策最鲜明的特征。优维克大学学者 Mark Gerard Connolly 认为,新工党的文化政策是经济工具主义与社会工具主义的混合:发展“创意产业”是经济工具主义的战略呈现,消除社会排斥是社会工具主义的政策创新^[1]。其实,以文化投入为手段在文化领域之外获取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60046)阶段性成果。

[1]Mark Gerard Connolly, “The ‘Liverpool model(s)’: cultural planning, Liverpool and Capital of Culture 20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3, Vol. 19, No. 2, p.165.

标收益是典型的文化工具主义。文化工具主义最早可以溯源到柏拉图,他提出艺术的转化能力应该被充分利用以促进社会公正。文化工具主义在英国的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19世纪初英国统治者将艺术与公共秩序、社会良俗紧密结合;二战结束后,艺术赞助、艺术投资的增长与战后英国的振兴战略同步,政府资助文化、引导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特征;撒切尔统治时代,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致国家文化投入大幅度削减,政府文化部门开始从实用主义视角寻找国家投入不足的原因,通过强调艺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民间组织、企业财团和基金会为文化发展募集资金;90年代中后期,新工党再一次将工具主义运用到文化政策领域,通过英国文化灵魂的重塑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

当代英国的文化工具主义首先将目标指向文化的经济能动作用。英国的“创意经济”国家战略绝不仅仅是语义学的表述,而是后工业化时期英国执政党对文化政策理论的重新界定。其根本目的是为文化寻找经济合理性,将文化与如火如荼的新经济维系在一起;受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将撒切尔主义的成功归因于与特定时期经济结构有关的社会与经济差异性导致的某种联合。信息技术对产业组织和社会消费方式的影响动摇了传统的文化商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假设,后工业主义、人力资本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信息时代的创新被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由于这种创新驱动力的来源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而不是文化艺术领域,通过借用技术创新的概念将“创意”、“创造性”与模糊的文化概念对接,巧妙地将文化从边缘引导到中心,为文化谋求国家经济利益提供理论支撑。作为创意经济核心动力的创意或创造性甚至已经远远超出最宽泛的文化概念的范畴。它被看作是提升英国所有经济产业活动的无形引擎和提升英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利器。新工党语境下的创意产业其实是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混合体。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等同起来,其实是非常肤浅的认知。英国政府通过文化创意发展创意经济的多重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掉了。

英国的文化工具主义将另外一极指向了社会融合。在新工党的文化政策语境中,文化创意不仅驱动经济发展,同样也能够带动社会发展。以往的社会政策主要建立于结构主义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理论基础上,通过解决社会结构性失衡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新工党为了将社会目标从社会公正转向社会融合以化解社会排斥,将文化投入不足视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其理论逻辑是文化投入不足会削弱个体的知识储备与技能,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而加剧社会对立与社会排斥。通过文化教育、艺术普及和创新创业技能的培养训练,可以间接而有效地达到社会目标。所以,在新工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城市文化规划战略中,文化被视为能够提高生活技能、积聚社会资本、增加社会自信、促进身心健康与社区和谐的软资产与内驱力。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性,相同或相异族群基于对国家主权的认同而聚合在一起,组成族群基本价值特征的个体的种族属性及其社会形态属性是国家认同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制度体系想要成为维护和保障个体与社会的有效力量,就必须具有能够将分散的社会个体聚合为具有共同政治纽带的共同体。英国新工党政府期望将特定历史与文化背景融入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使之成为社会融合的基本价值规范,从而达到既具有保障人民权利的功能又具有尊重个体权利、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人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功能。

此外,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融合成为新工党走“第三条道路”以规避来自于左右两翼攻击的政治风险的缓冲器,尤其是成为摆脱当代城市发展困境的灵丹妙药。

二、创意经济与城市再生——英国文化政策中经济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效果分析

1. 英国创意经济国家战略的路径选择

英国创意经济特别强调创意对于具有市场认知度的产品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期待创意能力

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下得到持续的升级与调整。创意产业的国家战略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是国家、区域以及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知识、技术、文化、创新对国家财富积累、传统产业提升重要性的过程。其政策实施路径主要有:

(1)智力资本集聚与学校艺术教育、艺术技能培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由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资助,英国艺术理事会负责管理,旨在推进学校创意教育的创意伙伴计划。第一阶段(2002-2005年),创意伙伴计划偏重艺术普及与艺术教育。文化政策目标是使年轻人在不同的艺术形态中开发他们的创意能力,并通过在文化领域中的规范的教育提升艺术的批评与鉴赏能力。第二阶段(2005-2009年)从艺术教育与艺术培训向提升“创造性学习”的“校园改进计划”转移,从“做艺术”(doing the arts)、拓展艺术技能向“大胆质疑,建立人际关系,发明与再创造,以及富于想象力”方向发展。除了创意伙伴计划,英国政府还将政策目标瞄准大学,认为大学的学位课程应该能够为培养创意人才提供智力支撑。“高等教育在缩小技能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高等教育必须与产业发展保持同步。在数字创意工业时代,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卓有成效地为未来毕业后的职业做准备,大学与产业需要合作。”^[1]学校艺术教育、艺术技能培育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储备智力资本,为英国的国家竞争力积累人才优势。

(2)文化资本注入与后产业时代的城市繁荣与产业结构升级。英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面临后工业时代倒逼传统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具体表现在经济持续低迷,增长乏力,地区发展失衡,失业率居高不下。例如,南部的伦敦大都市区与北部、西部日趋沉没的城市孤岛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明显;曼彻斯特、利物浦、爱丁堡等城市内部的贵族化与从事清洁、搬运、保安工作的城市边缘群体的贫困形成强烈的反差。通过文化资本的注入,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艺术馆、美术馆、歌剧院以及其它的文化遗产挖掘与推介,优化后工业时代英国衰落城市的文化氛围,完善文化基础设施,以差异化的城市文化内涵振兴旅游业。英国的许多城市将文化创造附加价值的潜在能力视作拯救裹足不前的城市经济的推进器,相信文化能够在吸引国际投资、引进地区急需的专业人才等方面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英格兰东南经济发展署(SEEDA)的区域经济战略将文化发展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通过城市文化培育“使本地区成为拥有强烈的文化认同的地方,成为成功吸引那些技术熟练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生活、居住、逗留与投资的地方”^[2]。城市能够通过创意获得新生。

创意经济的国家战略正契合了Seltzer and Bentley的“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思想:无重经济将信息、组织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视为生产力与竞争力的主要来源^[3]。只有更加有胆识魄力,更加有创造性,才能在无重经济的竞争环境下生存。

2. 英国创意经济国家战略的政策实施效果

英国文化政策以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激起了整个英国艺术领域的兴趣与热情。1988年迈耶斯考夫发表的报告《英国艺术的经济重要性》通过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积极鼓吹文化艺术的经济潜力,对英国文化政策的目标走向产生较大影响。此后十多年,经济影响研究成为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验证艺术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普遍工具。然而,实践证明通过文化公共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首先,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新的就业的预期被有意无意放大。早在1989年,经济学家高登·休斯便质疑艺术与文化产业对就业的贡献能力。他认为艺术与所谓的符号经济创造的就业特点是低薪、不

[1]<http://bridgingtheskillgap.files.wordpress.com/2013/01/emvet-final-report1.pdf>。

[2][http://www.seeda.org.uk/sustainableprosperity/culture&sport/culture/culture sport & creative industries/](http://www.seeda.org.uk/sustainableprosperity/culture&sport/culture/culture%20sport%20&creative%20industries/)。

[3]Seltzer, K., and Bentley, T., The Creative Ag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New Economy. London: DEMOS, 1999.

稳定与兼职,文化创意产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难题。财富集中在拥有名声的少数一线影视明星、新闻出版业巨头手中。而且,创意产业领域小微企业居多,以项目开发为生产特征的模式让文化创意市场提供的岗位大多为临时性的工作或者是兼职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休斯对迈耶斯考夫过高预测文化艺术的经济驱动力提出质疑:迈耶斯考夫估计英国文化艺术部门每年会有100亿英镑的经济营收,并能够提供49.6万个就业岗位。而休斯认为迈耶斯考夫不恰当地估计了艺术部门的经济总量,休斯经过自己的研究,将年经济营收修正为10亿英镑,新增就业岗位12万个。休斯的研究结果得到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前主席阿兰·匹考克的认同,认为迈耶斯考夫在其研究中过分夸大了艺术对经济的影响^[1]。

其次,城市经济复兴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英国政府为了将利物浦打造成世界文化城市,投入3亿英镑的公共资金用于博物馆、美术馆、会议中心、零售业、滨水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作为利物浦城市文化复兴的支撑条件。然而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城市复兴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发掘与开发使产业结构单一化,加剧了城市文化空心化的结构性脆弱。欧盟委员会对欧洲29个文化城市的评估已经证明:通过公共文化的巨大投入刺激后工业城市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再生的目标是失败的。在利物浦之前被视为样板的文化之都格拉斯哥十几年之后也没有明显的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证据。倒是那些没有被刻意规划设计、没有大规模经济投入、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经济与文化活力。格拉斯哥在1990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申报计划中开始背离这一活动原先旨在分享欧洲传统文化、增进社会和谐、通过文化提高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全民认同的最初目标,而是选择将文化作为城市营销推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杠杆工具,以文化作为吸引因子驱动服务业发展,以拯救衰退的传统工业经济。这一思路与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所奉行的城市创造力创新力驱动的战略相呼应,并借欧洲文化之都的申报掀起英国城市间文化竞争的热潮。

此外,创意经济模糊了许多性质迥异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如将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一并安放在创意经济的视野当中),也模糊了小型创新企业与个体创造行为的差异。

三、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英国文化政策中社会目标的路径选择与实施效果

1. 英国文化政策促进社会融合的具体路径

社会融合(social cohesion)的核心思想是保证不同社会群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平等拥有融入社区生活、享有基本权利、共同体参与决策的机会。社会融合的前提是解决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因为社会排斥是社会融合的障碍。社会排斥是1974年法国学者Rene Lenoir提出来的,用来指称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部分心理与生理残疾者、叛逆与社会边缘群体、问题家庭等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群。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具有满足社会结构稳定地运行和延续的功能,故而文化有益于稀释社会排斥引致的潜在风险。英国文化政策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的具体路径是:

(1)以艺术作为审美教育手段,解决当代社会的人性在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等方面的分裂状态,艺术接受过程所产生的正功能的情感体验可以有效调节心理平衡,达到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艺术的“卡塔西斯”功能,净化心灵,达到个体精神宇宙的完美与和谐,从而有益于道德提升,有益于社会。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失业、贫困、犯罪、健康等诱发因素导致某些亚群体缺乏社会归属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并被隔离或者边缘化的被动状态。早在1967年,英国艺术理事会的《皇家宪章》便对艺术资助的作用明确表述:提升艺术在英国普通公众和社会各阶层中的可及

[1]Alan Stanbridge, "Detour or dead-e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search for new cultural policy mod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2, Vol. 8 (2), p. 123.

性是艺术理事会的职责。90年代重捡这一概念,反映出英国政府面对后现代时期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谋求秩序重构以破解社会不利条件的尝试。英国政府和主要的公共艺术赞助机构特别注重评估艺术活动在减轻社会分化与社会排斥方面的正面效应。

(2)以文化认同为目标,突出历史、信仰、风俗的英国特征。通过政府和民间赞助维持国家文化的全球竞争力,同时扶持鼓励社区文化发展以促进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理解与文化交融,以文化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强化国民的英国文化认同,最终达到社会稳定团结。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主要从四个参照指标评价艺术对社会融合的积极影响以及提升社区绩效的能力:健康、犯罪、就业和教育。从文化政策谋求实现社会融合的目标来看,新工党的创意经济计划试图打破传统文化藩篱,以大众参与的形式累积文化资本以促进全面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005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开始推行“文化测试”(culture test),从文化内容、文化内核、文化实践进行评估打分,以决定政府是否资助英国电影的生产。尽管定义模糊,但整体来看,国家层面的文化指向更侧重于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建筑以及其它历史遗存等能够代表英国文化卓越性的显性符号。

2. 英国通过文化消弭社会排斥的政策实施效果

创意经济背景下的英国工具主义文化政策已经实施了近20年,实际效果并没有预想的显著。许多社会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是更加突出了。Phyllida Shaw在其《研究报告:艺术与社区邻里关系重建》中检讨了艺术与社会排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联,得出了如下结论:“相对于在国家最贫困社区开展的大量艺术活动而言,艺术对和谐邻里关系重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1]1996年英国著名的政策咨询与研究机构Comedia的专家Matarasso实施了一项有关艺术参与价值与社会目标之间关系的研究,致力于探寻艺术项目社会影响的科学评估方法^[2]。该课题选取了60个艺术项目为研究对象,选取600位艺术项目的发起人与参与者作为访谈对象、讨论组和问卷调查样本。基于产出驱动的绩效评估,Matarasso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合在一起,利用“社会审计”(social auditing)的方法来测量与社会目标及利益相关者关联的艺术活动或组织行为的社会影响。然而调查访谈设问的肤浅性与艺术项目实施的短暂性破坏了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性。艺术项目究竟怎样改变了参与者的人生方向,如何助力于社区发展与邻里和谐关系重建,检验结果的可信度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它远比检验产出要复杂得多。

如果说Matarasso的社会审计测量手段还仅仅是从样本数据的验证分析考察艺术促进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的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统计数据则反映出社会不同群体在文化创意领域的贡献与成就并不均衡。英国财政研究学会的报告显示,2008年英国的收入差距达到了自1961年以来的峰值,2009年的预算中,新工党的财政大臣通过向富人征收最高50%的税率重新进行社会再分配以弥合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文化政策并未能弥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的两极分离,在某种情况下,它加剧了这种分离。格拉斯哥1990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申请成功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正面的欢呼与赞赏大多是从表象上注意到城市文化风景的升级、旅游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质疑与反对大多是从格拉斯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追问文化工具主义的真实价值:居住在格拉斯哥谢特尔斯顿男性的预期寿命为63岁,低于英国全国平均寿命14岁,苏格兰最缺少教育与食物的20个贫困地区中格拉斯哥占了其中的16个。格拉斯哥社会与经济的两极分化似乎并没有能够具有说服力地验证文化

[1]DCMS (1999b),Policy Action Team 10. Research Report: Arts and Neighbourhood Renewal , DCMS, p.6.

[2]Matarasso, F. (1997)Use or Ornament? The Social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Arts (Comedia).

战略的正向社会功能^[1]。

期望通过文化化解社会排斥及其它社会矛盾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个体接受文化艺术的浸淫熏陶受制于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兴趣爱好等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维系在一起,如果离开文化赖以发挥影响力的经济和社会生存环境,文化的社会功能就无法起作用,社会融合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其次,通过文化艺术活动提升个人素养与道德层次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高雅艺术如歌剧、芭蕾、油画的艺术普及更需要时间惯性的缓慢推进,而政府以为美术馆的免费开放、每年数次的社区公益表演便能改变个人对社会的排斥情绪,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奢望。再次,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社会,英国政府秉持的基本是英国主流文化思维(所谓“英国性”),对外来移民实施文化同化的一贯政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倘若忽视从社会意识形态、族群文化诉求的视角寻求多元文化的平等表达与社会共存,政府倡导的文化参与与社区文化培训计划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亚文化圈的文化差异、文化对立,甚至可能会滋生隐性的文化的反功能。2011年8月6日的伦敦骚乱正是经济长期低迷、社会排斥、种族歧视的集中爆发。英国少数族裔处在社会底层,尤其是非洲和中东的移民竞争力低下,社会阶层的流动固化。文化作用力的发挥需要稳定、公平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环境。

四、文化过载与文化焦虑——英国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困惑

1. 文化界定的模糊与英国文化政策设计的摇摆与困惑

英国文化政策赋予文化承担拯救经济与社会认同等多重义务,显然是过分放大了文化的功能与作用,造成文化过载。为了实现文化的多元目标,弱化个体创造性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差异性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背景,反而会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引致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英国文化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第一大困惑便是国家、区域与地方对文化概念界定的模糊及由此带来的政策摇摆与频繁的矫正与调整。

英国国家层面的文化定义界定非常笼统。英国艺术委员会主要从国家文化战略视野彰显英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化特征和文化优势,强调文化能够使人们生活更加美好,艺术拥有为公众创造各种机会的力量;区域与地方层面对文化的理解则聚焦于特定地域空间的文化发展,具有典型的文化功利性。比如将文化具体化为能够为本地区创造经济收益的优势产业或需要扶持的产业类型(如休闲娱乐、观光旅行、体育赛事等)。外伦敦的贝克斯利区的文化战略所界定的文化宽度包含“贝克斯利区的设计与建筑,它的历史传统,艺术,文学,体育,民众参与的其它活动,以及能够参与这些活动的机会。”^[2]将社区文化与观光旅行、体育休闲一并纳入文化视野,泛文化特征显著。

文化界定的模糊突出表现在英国创意伙伴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关于创意教育内容的摇摆不定。新工党所确定的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以公平参与文化与经济活动作为通向社会融合的基本政策在实施了三年之后开始逐步演化为向高雅艺术、卓越文化的公众体验提供解读与体验的入口。2008年,政府重新定义创意知识与文化知识:“然而,本文中的文化不是宽泛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认为文化仅仅是包含了通过全部社会实践所创造的价值;相反,文化的概念更聚焦于通过艺术所追求的文化意义。概括的说,这里的‘艺术’包括了传统与当代艺术,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表演艺术,文学

[1]Mark Gerard Connolly, “The ‘Liverpool model(s)’: cultural planning, Liverpool and Capital of Culture 20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3, Vol. 19, No. 2, p.169.

[2]Bexley Council. 2003. A cultural strategy for the London borough of Bexley (2003 – 2008). Bexley,UK: Bexley Council, p.1.

与遗产,以及像博物馆与美术馆那样的与艺术有关的内部与外部机构。”^[1]英国文化政策中的文化内涵已经疏远刚性、狭义的文化指向。

2. 文化工业、大众娱乐文化可能导致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文化焦虑

创意工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无疑会促进大众流行文化的勃兴,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政策去激励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的生产创作,先进文化、卓越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将会被侵蚀,并最终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的持续竞争优势。英国创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摇摆或许正是看到了混合文化政策的弊端。2004年之后,新工党甚至开始主动将创意教育与社会、经济目标分离,承认文化是一种个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投资,并开始将高雅艺术重新纳入文化政策的视野。2005年之后,文化政策又开始寻求接轨市场的“创造性学习”教育,倡导培育适应创意经济需要的大胆创新的能力。2008年的政策文件《扶持优秀艺术》再一次主张在文化政策的讨论中恢复“卓越的”艺术^[2]。正是这种焦虑与疑惑,文化政策从顶层设计的那一刻开始便注定是一个不断调整与修正的过程。

五、结 语

通过对英国文化政策实施路径与实施效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英国文化政策在奉行自由主义文化政策的美国模式与秉承民族文化的国家干预的法国模式之间摇摆,其文化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创意经济的背景下发展到极致。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价值维度产生有限的实施效果,在文化的经济与社会辐射能力方面存在方法验证的困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有效证明,因为文化与经济、社会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愈益宽泛甚至随心所欲地定义原本便缺乏普遍认同的文化概念,使得符号象征、实践操作与制度体系经常安放在看似醒目的文化标题下,从而导致政策在实际操作与执行中的困惑与矛盾。

[责任编辑:平 啸]

Cultural Instrumentalism and Evalu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UK

Qian Zhizho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UK are on the basis of culture instrumentalism which culture function mainly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ccumulat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ostering creative skill,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UK pay more attention on social inclusion by implemen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culture identity. As a matter of fact, so far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trumental cultural policies is not operationally significant.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culture, so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not been verified effectively by practice. The ambiguity of culture definition results in further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Creative economy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intensifies the dangers of marginaliz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gh art.

Keywords: cultural instrumentalism; creative economy; social inclusion; cultural policies

[1]Holdon, J., 2008. Culture and learning: towards a new agenda. London: DEMOS, pp.10-11.

[2]McMaster, B., 2008. Supporting Excellence in the Arts: From Measurement to Judgement. London: DCMS.